

## 研究討論

## 詁經精舍與十九世紀中國教育、學術的變遷

黃克武

## 一、前言

清代學術思想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清代初期的晚明遺老之學，二是乾嘉考證之學，三是道咸以降的漢宋調和論與今文經學。同樣的，清代書院教育的發展也可分為三個階段，一為東林遺風之清初書院，二是雍正以後為科舉準備之書院，三為嘉慶以後重經史的書院（註一）。從以上的對比可見：第一階段中，學術與教育風氣一致；至第二階段則兩者分歧，第三階段學術與書院教育又逐漸有重新結合的趨勢。因此，第二段至第三階段的發展實為清代教育和學術史上極具意義的演變。在這發展過程中，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年）浙江巡撫阮元在杭州所建的詁經精舍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學術上，它代表十八世紀漢學的精神，也是十九世紀新學風的起點；在教育上，它反對科學時文的虛浮，而提倡經史實學，這二點都具有極深刻的意義。

前人對詁經精舍的研究可分為兩類，第一類作品為史料的搜集，主要為張謇的「詁經精舍志初稿」（一九四七）；第二類作品則闡發其意義，包括陳東原，「清代書院風氣之變遷」（一九三三），謝國禎，「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一九三

六），其後胡美琦，呂仁偉、張淑雅、李弘祺的文章都接受他們的觀點（註二）。英文著作方面，Susan Nann Jones 和 Philip A. Kuhn 的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Benjamin A. Elman, "The Hsueh-Hai Tang and the Rise of New Text Scholarship in Canton"（註三），都曾涉及詁經精舍。至於專題式的深入探討，則尚付闕如。因此本文希望結合以上兩類的作品，以詁經精舍的變遷為中心，探討十九世紀中國在內憂外患、西力衝擊與傳統內在演變之中，教育和學術上所產生的演變，而最終目的則是希望對「儒家及其近代命運」的大問題，提供一條解答的線索。

## 二、阮元與詁經精舍的建立（一八〇一—一八〇九）

詁經精舍的創立者阮元生於乾隆二十九年，卒於道光二十九年，江蘇儀徵人，字伯元，號雲台。他是有清一代少數能在學術上佔一席之地，又能在政治上一展長才的人物。三十五歲時中進士，七十二歲拜體仁閣大學士，一生之中宦途顯赫。嘉慶二年阮元任浙江學政，於西湖邊構屋五十間，集兩浙雋彥編

輯『經籍纂詁』一書。四年撫浙，六年以修書舊址闢爲書院，命名爲「詁經精舍」，詁經是指「不忘舊業且勗新知」，精舍則爲「漢學生徒所居之名」。精舍內奉祀許慎、鄭玄二人，並聘請當時大儒王昶和孫星衍爲主講，下設監院，揀選兩浙諸生讀書其中，最初學生人數共三十二人。

書院之中課士方式爲「問以十三經三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識，不用扁試糊名之法」(註四)，「晨夕講誦其中，月試以文，則多碑記論策諸體，未嘗雜以時藝，大要以窮經致用爲諸生勗也」(註五)。

精舍的宗旨，在教育方面反對科學造成的虛浮風氣；一般書院考課制藝帖詩，他們却大力提倡經史實學的研讀。這種看法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早在明代，就有人認爲「八股之害甚於焚書」；至清朝乾嘉時代，學者更是普遍對科學制度感到不滿。錢大昕便說：「嗚呼！自科學之法行，士大夫之習其業者，非孔孟之書不觀，非程朱之說不用。國無異學，學無他師，其所謂一道德以同俗者矣。然學者自就傅而後，初涉章句，即從事於應舉之文。父師所講授，無過於庸輒馱馱之詞；得其形似，便可以致功名……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蒙竊憂焉」(註六)；惠棟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惠氏四世傳經，他雖「饑寒困頓」，却絕意科名，在江浙一帶造成家傳經訓而不應科學的風氣(註七)。所以徐復觀先生指出：清代漢學興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對科學的虛偽知識、陳腐內容，有一種深刻的厭惡。他們認爲科第的得意與否，與其人的品格及真正學問無關，因而想在這種虛偽而陳腐的東西以外發現新的研究對象。科學八股所用

的材料主要是程朱所注的四書，因此他們提出經來與四書相抗，「這是比較乾淨的領域，比較新鮮的領域，是他們所不敢明言，實際上是有意義的一面」(註八)。乾嘉時代反對科學的思想透過阮元詁經精舍的建立而得以具體的實踐，他將零散的思想凝聚成書院教育中實際的項目。這也可以說是對學術本身經過理性的反省後，發展出一股力量，以期糾正教育的偏差，並力求教育與學術的一致。這是詁經精舍之建立在教育史上的重要意義。

其次，精舍學生除攻讀經史文學之外，並兼習天文、地理、算學。這種對科學的重視也是十八世紀學者的傳統，如錢大昕、汪中、焦循、李銳、戴震、江永、凌廷堪等人都是很好的例子。他們對科學的興趣一方面是基于「通儒」的理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清代樸學與科學研究之間似乎存有某種內在的連繫(註九)。阮元也是這樣的一個學者，他對天文、曆算、地理、物理都極感興趣。嘉慶四年，他利用庋藏在杭州文瀾閣的四庫全書編成『疇人傳』一書；這是一部包括二百四十三位中國歷代傑出曆算家和三十七位西方天文學者的傳記總集。二年之後他便創建了詁經精舍。因此我們若對『疇人傳』作一分析，或許可以了解阮元對科學的態度。

『疇人傳』一書表現出以下幾項思想特點(註一〇)：(1) 曆算是儒者必備的知識；(2) 將中國傳統曆算從迷信與數字神秘主義中解放出來，爲中國曆算學的發展播下一顆近代的種子；(3) 肯定數學與機器有利於民生日用的實用價值；(4) 具有改進與創新的觀念，認爲變的基礎是建立於對過去知識的尊重；(5) 實事求是；(6) 認爲應付西洋文化挑戰的理想人物是精通中西曆算、

堅守中國本位，而又能對本土曆算有積極貢獻的人。他認為：王錫闡、梅文鼎和戴震便是這些人物的典範。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疇人傳』之中有許多很有意義的觀念。如果詰經精舍的學生研讀這本書的話，自能一方面接受中國傳統的曆算知識，另一方面也接觸西方的東西；從而培養出足以有效因應西方文化挑戰的人才。

其次探討精舍的建立在學術方面的意義。我們以阮元的思想為中心來看這個問題，因為他的思想引導著精舍的風氣。阮元的思想相當的複雜，一生之中也有許多轉變。其創設精舍時的思想，可以從「詰經精舍記」一文中見其大概。他首先提出十八世紀漢學家一貫的主張，尊重經典和漢人之詰，「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詰不明；漢人之詰去聖賢為尤近」；其次他指出他自己早年求學自宋人義理之學入手；第三，讀經最後的目的是追求「聖人之道」（註一）。從這三點出發，再參證阮元的學術傳承，我們發現：阮元師承皖派戴震，而與吳派惠棟的主張有所不同。吳派論學尚古訓，尊師傅，守家法，堅持漢學的壁壘；皖派則主張從字義與名物度數通經義。因此皖派思想不像吳派那麼極端，他們雖然在治學上主張從訓詁入手，但訓詁名物之後仍要講求聖道，訓詁與義理不可偏廢。嘉慶三年，阮元作曾子十篇注釋，發明孔曾博學難易忠恕之事，認為「近人考證經史小學之書愈精，發明聖賢言行之書甚少，否則專以攻駁程朱為事，於顏曾純篤之學未之深究。茲注釋五卷，不敢存昔人門戶之見，而實以濟近時流派之偏也」（註二）。立論之中明顯的表示希望能調和漢學專重訓詁，宋學只講義理的偏頗，而想以義理濟訓詁。這種漢宋調和的思想對後來的學者有

很大的影響。

伴隨著漢宋調和論，阮元思想中還帶有重實踐的精神，一方面宋學之中本來就有濃厚的實踐色彩，另外阮元用訓詁的方法求證論語中「習」，「一貫」，及大學中「格物」三者的義理，最後認為三者的意義並無不同，都具有「行事」或「實踐」的意思（註三）。在「大學格物說」一文中他認為「格物者，至止於事物之謂也。凡國家天下五倫之事，無不當以身親至其處而履之，以止於至善也」，「聖人之道，無非實踐」（註四）。他將一切訓詁與義理中所討論的問題都歸宿到實踐二字。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了解阮元為什麼要建詰經精舍，以及精舍之中「大要以窮經致用為諸生勗也」的思想根源。

總之，詰經精舍的建立象徵著十八世紀教育與學術理想的實踐，和學術風氣與書院教育的融合；同時阮元等人也逐漸的步出十八世紀漢學傳統的藩籬，強調漢宋的調和，並重視實踐與經世的觀念。在十九世紀初年，當大多數的書院還沈迷於科舉之中的時候，詰經精舍樹起了一支新的旗幟，引導出十九世紀中國教育與學術的方向。

### 三、詰經精舍的中衰（一八〇九—一八六六）

西元一八〇九年至一八六六年，大約半個世紀的時間，精舍處於動亂之中，曾經三度停辦，一次是阮元去職之後，另外二次是鴉片戰爭和太平之亂期間。

嘉慶十四年，阮元因為浙江學政劉鳳誥主持科舉考試時「場規從嚴，士子懷恨致滋物議」（註五）。阮元受連帶處分而革職，離開了浙江。「精舍講舍即輟而勿舉者殆二十年，至富

海帆撫浙始漸中興」(註一六)。

爲什麼阮元離浙之後精舍即無法持續？首先我們必須探討書院的性質。精舍雖然由巡撫創建，但實際上仍屬私人興學，並非官立，經費的來源一方面來自阮元捐俸，另外也依賴鹽商的捐輸，精舍本身沒有田產，也沒有其它的收入，因此一旦阮元離任，精舍即因經費困窘被迫關閉。同時，阮元之後的浙撫任期都相當的短，無心興學，也不願捐出自己的薪俸，在精舍中斷的近二十年中，共有十七任巡撫，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任期在一年半以下，而其後對精舍有貢獻的巡撫任期都超三年(註一七)。可見地方長官任期長短與興學有密切的關係。其次，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影響精舍的興衰。十八世紀是兩浙鹽商最興盛的時期，造成了社會經濟的繁榮，連帶也影響到文風的昌盛，精舍在嘉慶年間的經費一部分就靠鹽商的捐助。但十九世紀以後鹽的利潤漸爲政府控制，鹽商收入減少，逐漸無法資助教育事業，在一八二四年精舍重修時「會浙商困，因廢不舉，巡撫大吏分俸給之，勿復取於商」(註一八)。

精舍重修完成之後盛況已不復當年，這時學術的重心由詁經精舍轉移到廣東學海堂。嘉慶二十二年阮元調任廣東巡撫，二十五年創辦學海堂。學海堂的建立深受詁經精舍的影響，這二個書院也一向並舉爲新學風的代表。我們把詁經精舍與學海堂作一對比，可以明顯的了解其間的變遷。在設立時間上前者爲一八〇一年，後者爲一八二〇年；地理上杭州是有歷史意義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廣州則爲貿易通商口岸和南方邊境的省會。這個轉變也象徵著東南財富重心的轉移，即從鹽商的領域轉變爲公行的領域；在領導人物方面，精舍的領導者都是進士出

身，曾在朝廷任職，有實際的行政經驗，也是享譽全國的學者；而學海堂的學長却缺乏這種通識的修養，最初的八人之中只有二個進士，只有一個人擔任過比地方學官還高的官，大致都是由地方政治和學術之中塑造出來的人物(註一九)。

在教育 and 學術方面，學海堂將詁經精舍的理想進一步的加以實踐，如課業方面「多士或習經傳，尋疏義於宋齊，或解文字，考故訓於倉雅，或析道理，宋晦庵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肅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註二〇)。除此之外還要研究天文學和數學(註二一)；其中有考證有義理，內容包含了經、史、文學與科學。而在目標上是一「但論學業，不論科名」(註二二)，學海堂大儒陳澧對科學制度也有嚴厲的批評(註二三)，認爲科學時文與經學考證，「皆俗學也，其心皆不在聖賢之經書也」(註二四)。

在漢宋調和方面，學海堂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如阮元在學海堂提倡研讀陳建之「學菴通辨」，這本書的主旨是辨朱陸異同，而推尊朱子，阮元認爲「皆表章正學之要言」(註二五)。陳澧受阮元的影響更力倡調和，「中年以前治經每有疑義，則解之考之，其後幡然而改，以爲解之不可勝解，考之不可勝考，乃尋求微言大義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而後解之，考之，論贊之，著爲學思錄一書，今改名爲東塾讀書記。此書……唯詳於朱子之學，大旨在不分漢宋門戶」(註二六)。從阮元到陳澧漢宋調和之學的發展相當明顯，阮元之時還是「訓詁明之後義理明」，是以訓詁爲主來談調和；陳澧則主張「讀經傳之言，固多古今不異，不必訓詁而明者，何不先於此而求其義理乎」(註二七)，義理已經可以置於訓詁之前了！

學海堂在學術上另一項特殊發展是今文經研究的興起，一般都認為今文學派起於常州莊存與，它雖然是漢學的反動，而實際上也是漢學的延伸（註二八），我們可以說它是考證運動的一部分（註二九），因為漢學的精神是向上溯源，因此自然會從東漢之學走向西漢今文經，而古文經真實性受人懷疑之後，也助長此一趨勢。阮元本身對公羊傳就很感興趣，他曾為孔廣森的『春秋公羊通義』寫序，文中溯源公羊研究在歷代的演變，孔廣森與何休在解釋上的不同，在結論中還指出公羊傳對孔子所著『春秋』之中微言大義的了解超過了左傳（註三〇）。此外更有意義的是阮元十分推崇東漢今文經學者何休（一二九——一八二），以為「其人絕無可議，其學如海，亦非後人所能窺，公羊之學與董子繁露相表裏」（註三一），因而將設在廣東的書院命名為「學海堂」。因此學海堂中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學生不僅討論漢宋之學，也研讀和思考今文經中的問題。今古文在當時絕非互為壁壘毫不相關。廖平和康有為的今文經學雖然不是直接受學海堂影響，却是在學海堂所孕育的學術風氣之下產生的（註三二）。

從詰經精舍與學海堂的對比，我們可以了解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在教育與學術上的發展。

當學海堂正繁盛之時，詰經精舍仍在風雨飄搖之中，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海疆不靖，舟山失守，數郡騷然……刀光槍聲震駭心目，是時欲捉筆論文，不惟不暇，亦不敢」（註三三），撫議成後才重開講肆。至一八六〇年太平之亂，「洪楊兩陷省城之後，精舍連棟，半鞠茂草」，亂平之後「碑石猶存，而諸家著述，叩之數藏書家，則已十唯四五，舍門前有

古柳樹，猶亂前物，摩娑其下，慨想舊時文采，為黯然也」（註三四）。

從一八〇九年至一八六六年是精舍的中衰時期，其間因為人事的變遷、經費的不足、內亂外患的騷擾而三度關閉，尤其在太平之亂以後，人員離散，書籍毀壞，房屋倒塌，精舍這一段不幸的遭遇，幾乎是中國歷史上書院災難的縮影，正是一儒門淡薄，收拾不住」。這種情形要到俞樾主掌精舍之後才逐漸改善。

#### 四、俞樾與詰經精舍晚期的變遷（一）

八六六—一九〇四

太平天國平定之後，同治五年，浙江布政使蔣益澧重建精舍，六年巡撫馬新貽聘請俞樾擔任主講，俞樾任職長達三十一年，「一時兩浙之士，承聞迪訓，蔚為通才者，不可勝數」（註三五），如戴望、黃以周、朱一新、吳承志、袁昶等人都成為有名的學者，章太炎也是出身精舍之中，可見俞樾影響之大。

俞樾生於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字蔭圃，號曲園，道光三十年進士，覆試時有詩句「花落春仍在」；而為曾國藩所激賞。後授河南學政，因監考嚴刻，為人所劾，其後罷官歸里，「拚命著書」，於經學、小學、文學、諸子學無不涉獵。俞樾在主掌精舍之初作有「重建詰經精舍記」（註三六），從文中可了解他對教育和學術的看法。首先，「精舍課士之法，及奉漢儒許鄭兩先生尊主，皆如文達故事」，在學術上則「講求古言古

制，由訓詁而名物，而義理，以通聖人之遺經；繆荃孫的「俞先生行狀」也記載「先生訓詁主漢學，義理主宋學，教弟子以通經致用，蔚為東南大師」（註三七）。而俞氏早年曾受學陳奐和宋翔鳳，得聞武進莊氏之說，故「治經頗右公羊」（註三八）。這些見解都延續前期的發展強調漢宋調和，主張兼治公羊，最後的目的是通經致用。俞氏在學術上的新發展則為諸子學的研究。漢學發展到乾嘉晚期，儒家經典研究已達山窮水盡之勢，許多學者的興趣自然延伸到先秦諸子。一八六八年俞樾完成『諸子平議』一書，這本書用力頗深，成就也很大。子學研究的興起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經學在古代為王官之學，子學則為百家之言，學者的興趣轉向諸子研究正意味著學術的多元化；而子學本身就是根據歷史經驗來討論政治、社會、人生的實際問題，所以也間接助長了經世致用的風氣。諸子之中俞樾獨好荀墨，因為荀子主張性惡以及崇禮崇學，又倡法後王，有實際主義的傾向，而與孟子的理想主義不同；同樣的他認為墨子「其言切實有用」，「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註三九）。梁啟超認為「晚清先秦諸子學之復活，實為思想解放一大關鍵」（註四〇），曲園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有貢獻的。

到了光緒初年，詁經精舍所帶起的新風氣已經得到相當普遍的反應，各地宗旨類似的書院接踵而設，「精舍出身諸君，類能本其所學，推宏教澤」（註四一），如黃以周在江陰南菁書院，王棻之在黃巖九峯書院，胡敬父子在崇文書院，朱一新在廣東廣雅書院，此外上海的詁經精舍、龍門書院，武昌的經心書院，長沙的校經堂，成都之尊經書院，都仿照詁經精舍之成規，尊重經史、研治實學。如光緒三年所建的九峯書院，在

黃巖縣志之中載有當時的學規：「兼實學以期致用也，凡四書時藝，試律小楷，為士子進身之楷，謂之舉業，自必人人學之，日月學之，無煩贅屬，唯舉業之外，所當學者不少，如九經、四史、三通、文選、八家、性理、說文諸書，以及天文、地理、漕運、水利、曆律、兵書，皆學者所宜究心，諸生有志讀書，必於舉業之外，兼習諸書，兼通諸務庶將來出而經世，即可行其學，毋僅以舉業了事也」（註四二）。可見當時雖然還是贊成學生考科舉，但已深深的感到只學習考試的內容是不夠的，如果有志讀書，並想出而經世，還要研讀上列那些更踏實的學問。第二個例子我們探討張之洞的興學。張氏一向關心教育，曾仿詁經精舍及學海堂之例，在湖北設經心書院，四川設尊經書院，兩廣設廣雅書院，目的是「通經學古，提倡士風」（註四三），以培養經世致用，衛道救國的人才。教育內容：經學以能通大義為主，史學以貫古今為主，性理之學以踐履篤實為主，經濟之學以知今切用為主，詞章之學以翔實爾雅為主，「其大旨總以博約兼資，文行並美為要」（註四四）。與一般專課時文的書院完全不同。張之洞本身和詁經精舍倡導的學風亦有極深的淵源，他聘請俞樾弟子朱一新主講廣雅，在他所寫的『書目答問』之中列有『詁經精舍文集』；他在兩廣總督任內，曾親詣陳澧墓前，自稱「私淑弟子」（註四五）。可見張之洞後來提議廢除科舉制度實與他在學術與教育上的經歷，以及精舍所倡導的學風有密切的關係。

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教育、學術的狀況和一八〇一年，詁經精舍成立之初已經有十分明顯的不同。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章太炎進入精舍，投入俞樾的

門下學習古典經籍，當時的老師還有高宰平、譚仲儀等人。太炎在精舍之中讀書七年，「橫經在席，砥礪時須，斂袖而聽，鋒芒不見」，「康成絕學，尚遊馬氏之門；叔重無雙，不廢賈君之說」；其後「分別古今師說，專慕劉子駿，其後徧尋荀卿、賈生、太史公、張子高，劉子政、左氏古義」（註四六）。在讀書之餘他也和一些觀念較新的朋友交往，他曾納會費十六元加入康有為所發起的強學會，偶而也投稿上報海館發表政見。俞樾曾經訓誡他，要他安心讀書，但是太炎的觀念却認為「弟子以治經侍先生，今之經學，淵源於顧寧人，顧公爲此，正欲使人推尋國姓，識漢虜之別，豈以劉殷崔浩期後生」（註四七）。光緒二十二年，梁啟超與夏曾佑兩人集資在上海辦「時務報」，聘太炎任撰述，雖然「俞先生頗不懌」，太炎仍然慨然應允，離開了詒經精舍。

章太炎這段經歷似乎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如果我們以康有為和梁啟超作一對比，便可窺見其中有十分相似之處。光緒三年，康有為從學海堂大儒朱次琦讀書，「大肆力於羣書，攻周禮、儀禮、爾雅、說文、水經之學，楚詞漢書文選杜詩徐庾文，皆能背誦」（註四八），一年多之後逐漸的却發現「以日埋故紙堆中，汨其靈明，漸厭之。日有新思，思考據家著書滿家，如戴東原，究復何用？因棄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至冬辭九江先生」（註四九）。梁啟超本來肄業學海堂，學習古典經籍，初見康有為時，有為對其沾沾自喜的訓詁詞章之學百端辯駁，啟超如受當頭棒喝，退出學海堂，拜康爲師，並言「生平知有學自此始」（註五〇）。太炎與康梁雖然在學術主張上完全不同，但却同樣的脫離傳統的書院，並在新的結社方式

，如強學會和時務報之下彼此搏聚。隨著世變衝擊日盛，傳統的書院已逐漸的不再吸引熱情激昂的知識分子。

就在章太炎離開精舍的光緒二十二年，浙江的樸學大師孫詒讓，在家鄉興辦新式學堂瑞安計學館，後又創方言館、瑞平化學堂、普通學堂、高等小學堂、女子初學堂等，對浙江教育的現代化有很大的貢獻（註五一）。孫氏以一樸學大師興辦新式教育是相當有意義的一件事，當時浙江樸學界中，詒讓與黃以周、俞樾鼎足而三（註五二），且與戴望、章太炎關係密切。在學術淵源上，他向慕休寧戴震之學，兼包金榜、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四大家。孫氏一生之中用力最深的是『周禮』、『墨子』兩書。『周禮』一書由其父自幼傳授，詒讓以爾雅說文證其訓詁，以大小戴記證其制度，參以漢唐以來諸儒舊說，沈浸二十餘年，草稿屢易，最後完成『周禮正義』八十六卷。在著作過程之中，他體認到「國家之富強從政教入，則無論新舊學均可折衷於是」（註五三）。此外他又花十年的時間寫成『墨子閒詁』一書，「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註五四）。書成之後請俞樾爲之作序，序中點明了詒讓治墨學的根本精神：「嗟呼，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儼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做精神於無用也」（註五五）。可見詒讓之從事教育事業與注重政教制度，與墨子之實踐精神是有關連的。

孫詒讓與俞樾同樣是晚清學術傳統下造就出來的人物，但孫氏能從傳統之中走出新的路子，以教育事業來融合新學與舊

學；俞樾的詁經精舍却侷限在傳統之中，對西學的衝擊感到無可奈何。甲午戰敗之後改革書院教育之聲四起，光緒二十一年浙江巡撫廖壽豐奏請設求是書院，專課中西實學。光緒二十二年俞樾作「三嘆息詩」，其中有「自從西學來西洋」、「利瑪新書方競譯」、「六藝表章空廢力」、「從此研經將輟筆」、「老夫爲之三嘆息」（註五六）的詩句，感嘆之中充滿了無奈。

光緒二十四年康梁變法，上諭各地大小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西之學校。後雖因變法失敗未徹底實行，但興學堂廢書院的風氣已漸成熟，俞樾知勢不可爲，力辭精舍講席。二十八年廣雅書院改設高等學堂，二十九年學海堂停辦。三十年詁經精舍正式結束，從創設到停辦共計一百零四年。

## 五、結 論

學術的復興是民族國家復興的生機，中國傳統理想本來是以學術領導政治，但明季以來却逆轉爲政治壓制學術，加以其它的因素，使學術退縮到純知識的領域，不但與政治脫離也與教育脫離，乾嘉學者受人批評之處正在於此。十九世紀詁經精舍建立之後，學者力求以學術來糾正科學教育的虛浮，他們將十八世紀學術的興趣推展到教育之上，以經史實學和科學來教育學生，最後的目的則是回到中國的理想，建立經世思想並參與政治、社會的實際問題。這是詁經精舍建立的根本意義。在學術上的演變也是配合著發展，從十八世紀的堅守漢學，走向漢宋調和——將知識與道德實踐融合爲一體。至一八二〇年代風氣傳到廣東之後，學生除了討論漢宋之學，還思考今文經中

的問題和經世致用之道，奠下今文學興起的基礎。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宗旨類似的書院逐漸普遍建立，接受這種觀念的人也愈來愈多。同時，俞樾倡導的諸子學不但爲學術開一新途徑，也促成思想上的解放。

就在傳統學術不斷的調整和適應的時候，西力的衝擊日盛，至十九世紀末葉，像章太炎這種熱情激昂的知識分子已不願留在書院之內；而像孫詒讓則轉而開辦新式學堂。這些都象徵著傳統書院日趨式微，他們雖然倡經世實學，但只知經史而不知西學，知道的話也很膚淺；他們雖講求天文曆算，但以中國傳統的東西爲主，且大多是紙面工夫；他們雖然反對科學的虛浮，而大多數人又不得不藉科學爲進身之階。因此當面臨急遽而動盪的新局面時，終爲歷史所淘汰。

但是詁經精舍所倡導的風氣仍然有其貢獻，如學術的新方向、教育與學術的結合，對現實政治社會的關懷，以及在晚期章太炎與孫詒讓的所作所爲，都代表儒家傳統在面對近代變局時所作的轉變和調整。就這一點而言，如同俞樾的詩句，「花落春仍在」，詁經精舍雖然結束了，但這一段歷史却具有永恆的意義。

### 註 釋

註一：胡美琦，中國教育史，（臺北，三民，民國六十七年），頁四九五以下。

註二：張整的論文載文瀾學報，二卷一期；陳東原文見學風，三卷五期；謝國禎的書收入文海，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六五種；胡美琦文見前引書；呂仁偉文見「浙江書院之研究」（師大史研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一年）；張淑雅文見「清末廣東



- 四大書院的研究」(臺大史研所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一年); 李弘祺文見「絳帳遺風——私人講學的傳統」, 收入浩瀚的學海(臺北, 聯經, 民國七十年)。
- 註三: 前文見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Vol. 10. 後文見清史問題, 四卷二期(一九七九)。
- 註四: 孫星衍, 「詁經精舍題名碑記」, 杭州府志卷十六, 頁十四(臺北, 成文, 據民國十一年鉛印本影印)。
- 註五: 陸堯春,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收入張謇前引文, 頁四九四。
- 註六: 見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卷四十九, 「布衣陳君墓碣」。
- 註七: 胡美琦前引書, 頁五〇四。
- 註八: 徐復觀, 「清代漢學衡論」, 收入兩漢思想史, 卷三(臺北, 學生, 民國六十八年), 頁五九五。
- 註九: 如梁啟超認為乾嘉學風和近世科學研究法極接近, 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 中華, 民國五十一年), 頁二二。
- 註一〇: 石錦, 「十七、十八世紀中國曆算家的治學態度」, 故宮文獻, 二卷一期, 民國五十九年, 頁四五至五一。
- 註一一: 引自張謇前引文, 頁四九二。
- 註一二: 轉引自何佑森, 「阮元的經學及其治學方法」, 故宮文獻二卷一期, 頁二〇。
- 註一三: 何佑森, 「清代漢宋之爭平議」, 文史哲學報二十七期(民國六十七年), 頁一〇一。
- 註一四: 阮元, 學經室一集, 卷二, 頁四七——四八, 「大學格物說」。
- 註一五: 蔡冠洛編, 清代七百名人傳(臺北, 世界, 民國二十六年), 頁一六四九。
- 註一六: 張謇前引文, 頁四九六。
- 註一七: 由魏秀梅編, 清代職官表(臺北, 中研院, 民國六十六年), 頁六一六——六一七之資料統計而成。
- 註一八: 張謇前引文, 頁五一五。
- 註一九: Susan Nann Jones and Philip A. Kuhn,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pp. 158-159.
- 註二〇: 引自張淑雅前引書, 頁四〇。
- 註二一: Benjamin A. Elman, "The Hsueh-hai Tang and the Rise of New Text Scholarship in Canton", p. 56.
- 註二二: 容肇祖, 「學海堂考」, 嶺南學報三卷四期, 民國二十三年, 頁一一。
- 註二三: Wolfgang Franke,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3-24.
- 註二四: 楊壽昌編, 「陳蘭甫先生遺稿」, 嶺南學報(二卷三期, 民國二十一年)頁一八四, 第三目「以義理為歸宿」。
- 註二五: 阮元, 學經室續集卷三, 頁一二六, 「學部通辨序」。
- 註二六: 何佑森, 「陳蘭甫的學術及其淵源」, 故宮文獻二卷四期(民國六十年)頁三, 引東塾集卷四復劉叔俛書。
- 註二七: 同註二四。
- 註二八: Philip C. Huang, *Liang Chi-chi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p. 16.
- 註二九: Benjamin A. Elman, *op. cit.*, p. 64.
- 註三〇: *Ibid.*, pp. 59-60.
- 註三一: 阮元, 學經室續集, 卷三, 頁一三〇, 「學海堂策問」。
- 註三二: 同註二九, 頁七〇至七一。
- 註三三: 張謇前引文, 頁四九九。
- 註三四: 同上, 頁五〇七。
- 註三五: 見繆荃孫, 「俞先生行狀」, 轉引自謝國禎前引書, 頁五。

註三六：張璠前引文，頁五〇〇。

註三七：同註三五。

註三八：蔡冠洛前引書，頁一六五五。

註三九：孫詒讓，墨子閒詁（臺北，商務，民國五十七年），頁一，俞序。

註四〇：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中華，民國五十一年），頁二四七。

註四一：張璠前引文，頁四八九。

註四二：黃巖縣志（光緒本），卷三十二「風土志」，頁八至九。

註四三：陳寶琛，「張文襄公墓志銘」，轉引自謝國禎前引書，頁一七〇。

註四四：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臺北，文海，民國五十二年），卷二二，奏議二二，頁十，「創建廣雅書院摺」。

註四五：謝國禎前引書，頁八。

註四六：章炳麟，太炎自訂年譜（臺北，文海，民國六十年），頁五一，附錄一「餘杭章先生墓志銘」。

註四七：同上，頁一八。及黃克武，「章太炎的早年生涯——一個心理的分析」，食貨月刊，九卷十期（民國六十九年），頁四一三—四一九。

註四八：康有為，康南海自訂年譜（臺北，文海，民國五十五年），頁九。

註四九：同上，頁十。

註五〇：沈雲龍，康有為評傳，收入康南海先生詩文集，冊一（臺北，文海，民國六十一年），頁九，引梁啓超，「三十自述」言。

註五一：李師國祁，「清季民初浙江地區近代化演進過程中的教育與文化事業」，中華學報，三卷二期（民國六十五年），頁一二四引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

註五二：張其昀等著，中國文學史論集（四）（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

員會，民國四十七年），頁一一四四。

註五三：蕭一山，清代通史（四）（臺北，商務，民國六十一年），頁一九一七。

註五四：同註三九。

註五五：同上，頁二。

註五六：曾昭旭，「曲園學記」，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十五號，民國六十年，頁三二七引俞樾詩集。

## 新書出版

金渭顯編：

### 高麗史中中韓關係史料彙編

本書以高麗史為底本，彙集中韓關係史料，上起五代，下迄明初，所收資料多為中國歷代正史所未見者，編年排列，條理明晰，尋檢便易，洵為研究中韓關係學者必備之參考書籍。

全書凡八八二頁，分裝二冊，二十四開本，現已出書，歡迎訂購。

定價：精裝每套 新臺幣六百元  
平裝每套 新臺幣五百元

本刊讀者八折優待，請利用郵政劃撥一六九三七號食貨出版社